

清代香山鐵城張氏家族與澳門的關係

——以《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為中心展開

湯開建

[摘要] 本文以《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為中心，結合《知新報》、《嶺南學生界》及其他閩粵族譜資料，首先對清代遷入澳門的南屏張氏家族展開深入細緻研究，再對南屏張氏家族第一支遷入澳門的時間、最早入居地、該家族在澳門的喪葬地及與澳門的聯姻關係進行考證，並對該家族成員在澳門、香港、海外所從事的商業活動予以鉤沉，最後，對南屏張氏家族參與晚清澳門維新運動的歷史資料探頤索隱，同時對南屏二張——張壽波與張仲球在澳門華人社會維新運動中充當的先驅者與領導者角色展開了研究與評價，展現了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家族對澳門歷史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關鍵詞] 澳門 張霈霖 張壽波 張仲球 《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 維新運動

在澳門歷史研究中，以族譜資料來展開澳門歷史問題研究恐怕還是學術界較為少用的一種手段。學者們之所以不太願意利用族譜資料來研究澳門，一是存世的各種族譜數量極為龐大，要在數以萬種的族譜文獻中找到與澳門相關的族譜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二是族譜中的澳門資料不僅難尋，即使尋找到也十分零碎，難以系統性地加以利用；三是很多學者均對族譜存以懷疑的態度，多認為族譜一般都不是出自於專門學者之手，所記錄的事情也大多為溢美之詞，難以確信。有鑑於此，筆者深深感到，我們雖然已經進行了一二十年的澳門中文檔案文獻資料整理，但發掘和利用族譜中的澳門歷史資料恐怕還是一個“盲區”；族譜中的澳門歷史資料，還是一座尚未被人開採的、極為珍貴的礦藏，希望引起澳門學術界的重視。本文擬以《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所保存的澳門史料展開對清代香山鐵城張氏家族與澳門關係的研究，這是一次嘗試，亦當屬拋磚引玉。

一、清代香山鐵城張氏家族遷居澳門及其與澳門的婚姻關係

香山鐵城張氏家族，源起廣東韶州曲江張九齡之後，宋季該族人仲德公自南雄珠璣巷遷往香山鐵城，正如族譜《世系考》所云：“見世糾紛，遊學鐵城，居於石頭村。”^①遂為香山鐵城

作者簡介：湯開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1冊卷首《世系考》，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8頁。石頭村，去香山縣城西南八里，屬仁厚鄉良字都三十七村之一。

張氏家族之始祖。第七世後又分三支，分別居住於香山附城、南屏和南朗：長房兆隆公居香山附城，二房兆冲公居南屏，三房兆陵公居南。其中，南屏張氏與澳門的關係最為密切。南屏，原名沙尾，至嘉慶時方改此名。張氏族譜《南屏圖》有對南屏歷史的詳細介紹：

南屏鄉，本名沙尾，地處大海，以年久沙礫堆積，迺成平原，四面皆海，故地宛在水中，沙尾之名或亦以此。迤南有地名汪田頭，趙宋時有漁人汪姓者，背水向山結廬以居，至今故址猶存。廬側有榕一株，大可十圍，為一鄉榕樹之冠，鄉人稱為千餘年之物，諒不誣也。相傳開鄉者，亦汪姓人，全鄉面積約一頃有奇，然地居海濱，人多貧苦。當乾嘉時，為海盜盤踞，幾至剿鄉。故有沙尾改名南屏之事。迨至道光後，海道大通，而業洋務者以本鄉人張、鄭兩姓為最多云。^①

南屏張氏到十二世時，又有國生公一支遷往澳門沙梨頭居住，^②這是張氏家族最早遷往澳門居住的一支。道光以後，由於“海道大通”，南屏張氏多往海外經商，到晚清後，南屏張氏家族二房各支紛紛移居澳門，光緒中期以後，移居澳門的二房家族有翹揚公、珮揚公、顯揚公、覲揚公、賡揚公、對揚公、現揚公、俊揚公、彥揚公、奕揚公和惠揚公等支（詳見後文）。

關於張氏家族遷往澳門沙梨頭居住的張國生一支情況，張國生生於康熙壬寅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卒於康熙癸酉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則我們可以判斷，張國生一支遷往澳門沙梨頭的時間最遲不會晚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由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前，香山地區仍在執行嚴格的“遷海”政策，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張國生一支遷往澳門沙梨頭的時間應該在1684—1693年之間。關於澳門沙梨頭張氏家族傳嬪世系，我們根據《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的資料列表於下（表1）：

表1 澳門沙梨頭張氏家族世系表

世次	姓名	生卒年
1	張國生（煦高）	1662 — 1693
2	張蘭顯（存顯）	1693 — 1775
3	張衡桂	？
3	張衡華	1745 — 1808
4	張輔通	1774 — ？
4	張輔金	1780 — 1828
4	張輔玉	1783 — 1842
5	張兆揚	1815 — 1858
5	張保（揚）	1824 — 1838
5	張年（揚）	？
6	張建常（安全）	1849 — ？
7	張有華	1872 — ？
7	張有明	1873 — ？
7	張有棠	1878 — 1896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祠宇譜·南屏圖》，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2頁。

②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雜記譜·各房居止》，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頁。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香山鐵城張氏家族南屏張氏一支曾於清康熙年間遷入澳門，在澳門沙梨頭村居住，從康熙時張國生開始，直到光緒末張有棠輩，一共傳承七世，成為澳門沙梨頭村最早保存有世系姓名的一代村民。澳門沙梨頭在明代已經開村，一幅後人描述1622年荷蘭人進攻澳門的路線地圖顯示，在澳門半島沙梨頭地區標有“Chinese Village Patane”之名，“Patane”即沙梨頭的葡文名，所以這個地名應稱為“沙梨頭中國村”，^①這應該是澳門開埠以後在澳門半島出現的僅次於“望下村”的第二個中國村落。又據民國十三年《沙梨頭永福古社重修碑志》記載：“神靈赫奕，同沐洪庥；廟貌莊嚴，藉宏瞻仰。曩自明季，以迄於茲，由嘉慶重修久矣。”^②沙梨頭永福古社建成於明朝末年，完全可以證明沙梨頭在明代已經開村，明朝時澳門沙梨頭地區已有華人居住，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從明啟禎時期一直到清康熙時，我們找不到任何一位在沙梨頭地區居住的華人之名。因此，南屏張氏家族十二世張國生一支的遷入，應該是我們在歷史文獻中發現的最早的一支正式在該村居住且保存有明確姓名的居民。因此，張氏家族移居澳門沙梨頭為我們研究明清時期澳門村落史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曲江張氏家族從宋季遷往香山鐵城後，到第七世時又分為三支：長房張兆隆居香山附城，其後又有移居蓮塘坑、外埔、南屏、平嵐村、老鴉岡、埔仔、外界涌等地；二房張兆冲居南屏，其後十二世張國生移居澳門沙梨頭；三房張兆陵居南萌亨美，其後十三世張蘭卿移居左步頭。張氏家族三房除二房十二世張國生一支定居澳門外，其餘各房各支均散居分佈在緊鄰澳門半島的香山縣村落。香山張氏家族最早與澳門發生關係即將其家族墳地定於澳門，我們找到張氏家族第一位埋葬的澳門者為三房十二世張桂生，卒於公元1716年，埋葬於澳門三吧門外，與其妻林氏合葬。最後一位埋葬於澳門者為二房十四世的張保揚，卒於公元1838年，埋葬於澳門三吧門外，葬於澳門者起於1716年，終於1838年，為122年，期間有18位張氏家族成員埋葬澳門。而且，這18位張氏家族成員埋葬澳門的時間均在鴉片戰爭之前，鴉片戰爭後，1849年澳門總督亞馬留（Comandante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開始拓展澳門城區，將葡萄牙管治區從舊城牆一直拓展到關閘，整個澳門半島北部地區逐漸淪為澳門葡萄牙管治區。從此澳門非基督徒華人墳地僅保存望廈墳場一地，這應該是張氏家族埋葬澳門的記錄止於1838年的原因。下面從族譜中勾輯該家族埋葬澳門者列表如次（表2）：

① 薛鳳旋編著：《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29頁。

② 中華民國十三年《沙梨頭永福古社重修碑志》，見王文達：《澳門掌故》之10《古廟小志》，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1頁。

表2 張氏家族埋葬澳門人物表

序號	姓名	世系	生卒年	埋葬地點	資料出處
1	張國生妻容氏	2/12	1670 - 1736 後	澳門三吧門外	3/3/2
2	張蘭顯（存顯）	2/13	1693 - 1775	澳門三吧門外	3/3/4
3	張蘭顯妻侯氏	2/13	1703 - 1749	澳門三吧門外	3/3/4
4	張衡桂	2/14	不詳	澳門沙岡	3/3/6
5	張衡華	2/14	1745 - 1808	澳門交椅環	3/3/6
6	張衡華妻黃氏	2/14	1748 - 1822	澳門交椅環	3/3/6
7	張輔金	2/14	1780 - 1828	澳門交椅環	3/3/10
8	張保揚	2/14	1824 - 1838	澳門三吧門外	3/3/17
9	張年揚	2/14	不詳，保揚弟	澳門關關沙	3/3/17
10	張桂生	3/12	1646 - 1716	澳門三吧門外	3/4/3
11	張桂生妻林氏	3/12	1654 - 1662 後	澳門三吧門外	3/4/3
12	張蘭標（佑明）	3/13	1690 - 1768	澳門三吧門外	3/4/4
13	張蘭標妻阮氏	3/13	1684 - 1771	澳門三吧門外	3/4/4
14	張蘭芳妻林氏	3/13	1693 - 1774	澳門三吧門外埔	3/4/5
15	張衡超（鳳和）	3/14	1716 - 1762	澳門三吧門外	3/4/5
16	張衡超妻麥氏	3/14	1723 - 1765	澳門三吧門外	3/4/6
17	張輔君（道琬）	3/15	1747 - 1775	澳門三吧門外	3/4/7
18	張輔君妻李氏	3/15	1750 - 1785	澳門三吧門外	3/4/7

從該家族埋葬的澳門墓地看，絕大部分主要埋在三吧門外，據上表，葬於三吧門外者共有13人。在其他的族譜中，也有大量的澳門華人家族成員葬於三吧門外。澳門葡萄牙城自建成起就是有四個城門，《澳門紀略》稱：“大門一，曰三巴門。小門三，曰小三巴門、曰沙梨頭門、曰花王廟門。”^①沈志亮稱：“啞嗎嘞行為兇暴，在三巴門外開闢馬道，平毀附近墳墓。”^②光緒十二年（1886），委員補用知府德福稱：“三巴門外舊多華人故墓。”^③三吧門外，應指今水坑尾門外及東望洋山麓一帶，這是鴉片戰爭前澳門華人主要的墓葬之地。

除三吧門外，張氏家族的澳門墓地還有沙岡、關關沙和交椅環。沙岡，靠內港海邊，今澳門鏡湖醫院所在位置即舊沙岡地，該地建村應在鴉片戰爭以後，建村之前這裏原是一片亂葬墳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兩廣總督耆英等稱沙岡“田廬墳墓鱗次櫛比”。^④澳門華人葬於沙岡者甚多，如香山林氏家族的林贊公，就葬於澳門望下沙岡。^⑤又如香山容氏家族之容錦華，續娶韋氏，續葬澳門沙岡。^⑥這些材料可以證明，沙岡也是澳門華人的主要墳葬之地。

①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卷下《澳蕃篇》，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147頁。

② [清]文慶：《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475“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庚辰”，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年，第974頁。

③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委員補用知府德福等為澳門之事應聲言斷其接濟以使其就範事稟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5頁。

④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2冊《兩廣總督耆英等奏覆體察澳夷實在情形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2頁。

⑤ [民國]林維祺：《香山平嵐林氏族譜》卷2《宗支譜》，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第109—110頁。

⑥ [清]容琬：《香山容氏譜牒》卷12《兆七房世傳》，珠海市檔案館藏清光緒乙丑年刊本，第22頁。

關閘沙，在澳門關閘附近，清人鍾啟韶言：“香山盡處有路名關閘沙，直出抵澳，若蓮莖焉。其兩傍為內外洋，水分二色，內紅外黑，亦曰紅黑海。中有關，曰飛沙。”^①光緒十二年（1886），委員補用知府德福稱：“由花園為馬路至關閘，不過二三里，東面臨海，西面荒山，舊為華人墳墓，尚未建造房屋。”^②據《蔡氏族譜》，蔡鴻寶續娶妻子李氏卒於嘉慶丁丑年八月初十日子時，亦葬於關閘沙。^③據《楊氏族譜》，楊官澤，早逝，陪葬於澳門關閘沙林氏婆墓右。^④可證，澳門關閘兩旁的沙地亦為華人墳葬之地。

交椅環，又作校椅環，此地名在《香山縣志》中無記錄，不知在何處，但其他族譜也多有葬於澳門交椅環者，如香山平嵐林氏家族的林瑞、^⑤香山容氏家族中容照的妻子澳門女譚氏、^⑥容敦敘之妻梁氏均葬於澳門交椅環。^⑦嘉慶十五年十月廣東布政使曾燠稱：“歷來護送貨船來粵之兵船，在川鼻、交椅、零丁、雞頸等洋面灣泊。”^⑧此處的“交椅”很可能就是指的澳門交椅環，應在東望洋山南麓海邊。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只有二房張國生一支是定居澳門者，而上表張國生一家葬於澳門近9人，其他9人屬於三房張兆陵一支，三房的居住地在南萌亨美和左步頭，亨美和左步頭均在現今中山市南萌鎮稍東南之地，距離澳門關閘還有三四十里的路程，為甚麼這一支張氏家族可以將其墓地移入澳門？筆者懷疑，另外三房張兆陵一支9人埋葬澳門的原因很可能是從三房十二世張桂生開始，該家族也開始移居澳門，只是族譜中沒有明確記錄。上述三房的9位張氏家族成員為張桂生夫婦、張桂生兒媳林氏、張桂生孫張衡超夫婦、張桂生曾孫張輔君夫婦，而張蘭標為張桂生之侄，當張桂生一家遷居澳門後，張蘭標亦到澳門投奔其叔父，最後死於澳門而葬於澳門。不然，無法解釋這一支居住澳門關閘外南萌地區的張氏家族成員如何將墓地遷入澳門，如上述推測無誤，以上埋葬於澳門的張氏家族成員都應該是清康熙以後遷居澳門的，這就是說，香山張氏家族除了二房十二世張國生一支遷入澳門沙梨頭外，還有三房十二世張桂生一支亦遷入澳門。

曲江張氏家族從宋季遷往香山鐵城後，到第七世時分為三支：長房張兆隆居香山附城，其後又有移居蓮塘坑、外埔、南屏、平嵐村、老鴉岡、埔仔、外界涌等地；二房張兆冲居南屏，其後十二世張國生移居澳門沙梨頭；三房張兆陵居南萌亨美，其後十三世張蘭卿移居左步頭。^⑨香山張氏家族前七世居鐵城者大概都在明弘治、嘉靖之時，故與澳門沒有關係。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正式入駐澳門後，香山張氏家族大概在明末之時又從鐵城移居南屏、南萌、界涌等地，其居住地更加接近澳門，但整個明代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資料記載張氏家族與澳門發生

① [清]鍾啟韶：《聽鐘樓詩鈔》卷3《澳門雜事詩十二首並序》，清道光十年刊本，第17頁。

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委員補用知府德福等為澳門之事應聲言斷其接濟以使其就範事稟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5頁。

③ [清]蔡永建：《閩省晉江梅塘蔡氏遷粵家譜》卷3《二房昭穆》，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光緒三十三年刻本，圖書編號K/0.189/616，第2頁。

④ [清]楊蔭光：《香山石岐南關楊氏族譜》卷8《二十二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石岐敬思堂重修本，圖書編號K/0.189/203.2，第43頁。

⑤ [民國]林維祺：《香山平嵐林氏族譜》卷2《宗支譜》，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第64頁。

⑥ [民國]容聯芳：《香山容氏譜牒》卷3《兆一房盛茂支世傳》，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十八年長世堂鉛印本，第37頁。

⑦ [民國]容聯芳：《香山容氏譜牒》卷15《兆六房善公支世傳》，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十八年長世堂鉛印本，第8—9頁。

⑧ [清]梁廷枏總纂：《粵海關志》卷29《夷商》4，袁鍾仁校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6頁。

⑨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雜記譜·各房居止》，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頁。

關係。從族譜現存資料反映，香山張氏家族從清代開始就與澳門有着較為密切的婚姻關係。據此族譜資料統計，香山張氏家族與澳門婚配家庭共26家，婚配者為30人，第一位與澳門發生婚姻關係的是二房十五世張輔亮，他的生卒年為公元1765—1793年之間，其娶妻為澳門羅氏，雖然我們無法知道其與澳門羅氏結婚的準確時間，但大體可以判斷其與澳門發生婚姻關係的大致時間為18世紀末。最後一位與澳門發生婚姻關係者當為長房十八世張肇開，其生卒年為1878—1904年，如果以20歲娶妻計算，則他與澳門發生婚姻關係約在公元1898年。這就是說，在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內，香山張氏家族與澳門發生婚姻關係者達到30人，大約每三年就有一次婚配關係發生。資料顯示，香山家族娶澳門女為妻者16人，而張氏家族嫁女於澳門者14人。與澳門發生婚姻關係者主要在長房和二房之內，其中長房為5人，二房為25人，也就是說，南屏張氏是張氏家族中與澳門通婚的主體部分。在我們沒有獲得全部澳門家族史資料之前，就目前所見，這應是與澳門發生婚姻關係最為密切的一個家族（表3）。

表3 香山張氏家族與澳門通婚表

序號	姓名	世系	生卒年	嫁娶對象	資料出處
1	張輔亮（文聯）	二房 /15	1765 — 1793	娶澳門羅氏	3/3/7
2	張學揚（在儒）	二房 /16	1801 — 1868	娶澳門王氏	3/3/12
3	張對揚（在瓊）	二房 /16	1801 — 1853	嫁女澳門邱衡端	3/3/13
4	張翹揚（在經）	二房 /16	1813 — 1874	嫁女澳門宋仲升	3/3/14
5	張惠揚（在元）	二房 /16	1807 — 1886	娶澳門潘氏	3/3/17
6	張建輝（以望）	二房 /16	1843 — ？	嫁女澳門陳崇光	3/3/24
7	張建成（以寅）	二房 /16	1847 — ？	嫁女澳門	3/3/24
8	張建華（以爽）	二房 /16	1833 — ？	娶澳門李氏	3/3/25
9	張建和（以田）	二房 /16	1835 — 1888	嫁女澳門某姓	3/3/26
10	張國其	長房 /17	不詳	娶澳門梁氏	2/1/34
11	張建榮（以漣）	二房 /17	1829 — 1877	娶澳門沙梨頭陳榮發女	3/3/18
12	張建人（以釗）	二房 /17	1835 — 1895	娶澳門蔡融谷女	3/3/21
13	張建廷（以燦）	二房 /17	1844 — 1872	嫁女澳門蔡姓	3/3/21
14	張建升（以永）	二房 /17	1834 — 1907	娶望廈黃讓詩女	3/3/21
15	張建鼎（以欽）	二房 /17	1845 — 1881	娶澳門謝德堅姊	3/3/22
16	張健成（惠德）	長房 /18	1787 — ？	嫁女望廈宋氏	2/2/46
17	張亮宏（廷就）	長房 /18	1842 — 1883	嫁女澳門李文霖	2/2/49-50
18	張仁宏（廷鑑）	長房 /18	1853 — 1890	嫁女澳門柯天養	2/2/50
19	張肇開（履端）	長房 /18	1878 — 1904	娶澳門戴禮傳次女	2/2/78
20	張家饒（有聰）	二房 /18	1874 — 1895	娶澳門沙梨頭鄭東橋次女	3/3/27
21	張家權（有年）	二房 /18	1840 — 1899	長女嫁澳門陸慶南，五女嫁澳門曹子幹，七女嫁澳門鄭姓，八女嫁澳門曹喜翁第十五子，九女嫁澳門林姓	3/3/29
22	張家潤（有志）	二房 /18	1869 — ？	娶澳門譚氏	3/3/29
23	張家彩（有林）	二房 /18	1875 — ？	娶澳門禡氏	3/3/30
24	張家閎（有灝）	二房 /18	1861 — 1894	娶雍陌鄉鄭啟華六女	3/3/30-31
25	張家憲（有章）	二房 /18	1867 — 1902	娶澳門謝氏	3/3/33
26	張家煥（鴻猷）	二房 /18	1856 — 1891	娶澳門新橋郭敬熙女	3/3/35

香山張氏家族從第七世分三支再遷後，長房和三房均未見顯達，為二房南屏張兆冲一支，從八世張輔邦開始在廣州經商，“以居奇致富”，開始發達，後成為南屏望族。該家族人多往海外經商，故應與澳門發生較多的關係，因此在香山張氏家族中二房南屏張氏與澳門通婚者最多，且通婚者多為澳門富家，如二房十八世張家閔所娶雍陌鄉鄭啟華六女，鄭啟華在同治以後早已定居澳門，亦為澳門的名門望族，假設張家閔20歲娶鄭女，則在1881年。1880年代，正是澳門鄭氏家族發展的頂峰時代，著名的澳門鄭家大屋就建於此時。南屏張氏與澳門鄭氏通婚，可以反映南屏張氏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又如張翹揚嫁女澳門宋仲升，宋仲升，諱英濬，又名文翔，號仲升，國學生，宋常熙次子，生咸豐甲寅（1854）八月十五辰時，澳門著名商人宋紳（子衡）為其嫡叔。^①又如二房十八世張家權，其長女嫁於澳門陸慶南，亦為澳門富商，民國初年與其弟陸翼南在澳門創辦《澳門時報》，成為澳門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再如長房十八世張仁宏嫁女於澳門柯天養，柯天養，亦名柯亦池，為澳門富商柯三之子，^②其弟柯六是光緒時期澳門著名的賭商。再如二房十八世張家權，第五個女兒嫁給澳門曹子幹，此曹子幹疑為澳門早期著名賭商曹有的子侄輩，曹有之子為曹子基、曹子祥、曹子珊等，故曹子幹亦當為曹有之後。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南屏張氏家族與澳門富商多有通婚關係，南屏張氏亦因經商致富，故與澳門商業界多有往來聯繫。南屏張氏家族早期遷至澳門定居僅十二世張國生一支，而到晚清以後定居澳門者日多，並在荷蘭園、三巴仔橫街置有物業，此亦說明南屏張氏家族由於與澳門通婚的關係，而逐漸發展在澳門的人際及商業網絡。

另外，二房十七世張建榮所娶的澳門沙梨頭陳榮發的女兒，此陳榮發很可能是沙梨頭的小商戶，據光緒二年（1876）《重修觀音古廟碑誌》所載，此陳榮發亦為捐錢修廟的澳門商戶之一，但捐錢不多，僅為八錢。^③

二、香山張氏家族的海外及港澳經商活動

曲江張氏家族遷至香山鐵城後，雖為香山望族，仍以農耕為本，詩書為家，從始祖仲德公開始，多為郡邑庠生、貢生，到十九世時，張燦宗、張燦彬兄弟及張玉濤均中舉人，十八世張家權為清政府授奉政大夫候補府同知分發福建省補用署理福州福清縣正堂。^④由於香山地處海濱，又鄰近澳門，故香山之民經商行賈之風甚盛。特別是“迨至道光後，海道大通，而業洋務者以本鄉人張、鄭兩姓為最多”。^⑤香山張氏家族最早經商者當為二房南屏張氏家族之張輔邦公，張輔邦，諱志炳，號文岳，生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十二日，卒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

① [清]宋章郁、宋義光：《鶴山宋氏族譜》卷9《香山澳門遠祥公房行實》，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光緒三年羊城合成齋刊本，第17—18頁。

② 湯開建、吳志良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904年10月8日第41號”，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402頁。

③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5頁。

④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科舉仕宦》，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頁。

⑤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祠宇譜·南屏圖》，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2頁。

月十八日。曾授登仕郎、儒林郎候選州同加二級，誥授奉政大夫，賜贈朝議大夫。^①據咸豐時容鏡《張文岳公行述》稱：

及壯，遊穗城，志在營生，常與士君子遊覽海幢，聯修松雪堂，以為憩息之區。

公雖商也，而士其行焉。迨嘉慶癸酉，讀老子知足不辰篇，翻然改計，遂賦歸來，置田

園，營堂構，常賁予家，詢河洛理數，又邀抵其府，虛心下問，交以忘年跡。^②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概在乾隆末年19世紀初，張輔邦開始到廣州經商，他雖然是個商人，但是其行為卻是儒士，而且還可以看出，他經商是成功的，“輔邦公以居奇致富”，^③所以能歸家“置田園，營堂構”。自二房十六世張疊揚時，該家族的商業繼續發揚光大。張疊揚諱在崧，號岳之，生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卒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④大概在乾隆末年：

張疊揚隨叔父文岳公經商省會，文岳公知公為人樸誠，有幹略，器重之。已而，文

岳公歸營菟裘，以商事委公，由是得持筭鑰，權子母。^⑤

張疊揚的父親張輔蒼也曾“賈外洋十餘年，卒不獲厚貲而返”。^⑥就是說，張輔蒼曾經到海外經商十幾年，但並沒有賺到大錢而返回家鄉。據咸豐七年蘇騰芳《岳之張先生行述》稱張疊揚：

從嫡叔輔邦公往省貿易，艱苦備嘗。輔邦公以居奇致富，而公亦年長可倚，遂將生

理委公。^⑦

香山張氏二房之商業貿易主要在省城廣州，而且“以居奇致富”。到二房十七世張建詩時，開始將張氏家族的商業貿易擴展至海外。張建詩諱以楷，號式軒，國學生，誥授奉政大夫候選同知，奉旨賞戴花翎，晉封通議大夫，生於道光十八年（1838），卒於光緒十九年（1893）。張建詩少年聰敏，長於詩書，據民國八年盧子駿《張式軒公行述》稱：

翹揚公恐儒冠誤人，急令服賈。咸豐中，英人經營香港，商業漸盛。公始至就職於

新公司，新公司者，西人之俱樂部也，公有幹濟，篤信義雅，為西人器重，以此洊擢要

職。^⑧

翹揚公即張建詩之父，他不希望其子走科舉之道，並認為“儒冠誤人”，可以反映此時的張氏家族已經深受港澳之地商業浸潤之風的影響，而重經商輕科舉。所以，張父命建詩學習經商，而且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8頁。

②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2頁。

③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4頁。

④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1頁。

⑤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頁。

⑥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4頁。

⑦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4頁。

⑧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6—7頁。

讓他去香港發展。毗鄰澳門的南屏之人往香港而不去澳門發展商業，足見當時澳門商業之式微。這也是張氏家族最早在香港發展的一支。

張氏家族最早赴澳門經商者為長房十八世張霈霖。張霈霖，字含宏，號沃生，世居香山鴉岡，生於道光八年（1828），卒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為國學生候選分巡道，誥授中憲大夫加三級，覃恩晉授通奉大夫，戴賞花翎，疊封文林郎。^①據光緒三十年陳昭常《誥授通奉大夫沃生張公傳》記載：

其長也，少負大志，能讀父書，天姿明敏，過目輒能記憶，旋以家貧，年十三遂棄舉業，遊澳門，隨宗叔永殷公學賈，盡通洋務。^②

這就是說，香山張氏家族長房一支到十八世時家境已經貧困，所以在1841年他十三歲時就來到澳門，向他的同宗叔父張永殷學習經商，學習洋務。也就是說，在香港開埠之前，張霈霖就到了澳門學習經商，熟悉洋務，為其後來在香港發展商業打下基礎。前引《誥授通奉大夫沃生張公傳》稱：

時香港初闢，百貨雲蒸。公毅然過港，十八歲為孖刺士甸臣洋行辦房主席，居奇致富，中外交仰。爰自創亨昌煤炭廠，並倡設輪船三艘：曰羅素，曰三洛，曰美利，以往來省港澳，行旅稱便。繼設裕昇洋貨店、裕成麵包店，生業日擴。^③

從這一段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張霈霖在香港開埠之初，也就是1842—1843年間就已經從澳門到香港經商，到十八歲時即1846年時，由於他在澳門積累了洋務經驗，又在香港工作兩三年後，很快當上了孖刺士甸臣洋行辦房主席，而且發財致富，並自己創辦亨昌煤炭廠。不久，他又購置輪船三艘，羅素號、三洛號和美利號航行於省港澳之間。在1860年英國人創辦省港澳輪船公司之前，有很多中國商人購置輪船在廣州、香港、澳門之間航行，張霈霖在香港創設的企業就是其中之一，有資料稱：

掛美國旗的小火輪美利號(Meelee)，是1859年在香港造成的，屬中國人所有，航行廣州、澳門航線，船長和事務長都是外國人。載重幾十噸到百餘噸的小火輪，並可用於拖帶木船，是當時華商購買較多的。^④

這裏指的就是張霈霖所創辦的輪船公司，“美利”號為該輪船公司的三艘輪船之一。據此可以得知，當時張霈霖創辦的輪船公司還是打着美國人的旗號來經營航運事業的。這段材料十分重要，為我們認識英國人創辦省港澳輪船公司之前香港華商對發展省港澳航運事業的貢獻。

張霈霖在香港經營的實業還有開設裕昇洋貨店和裕成麵包店，其在香港的商業活動日益擴展，越做越大。咸豐六年（1856）年尾，張霈霖所開的裕成麵包店爆發“毒麵包”案，前引《誥授通奉大夫沃生張公傳》對此事有記載：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2冊卷2《兆隆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52頁。

②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8頁。

③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8頁。

④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379頁。

時工役眾多，日無暇晷，有某役因不慎誤投雜物於麵粉，西人售食悉皆暈眩顛倒。時咸豐丙辰秋，英法入寇粵城，朝廷有事兵戎，英人因疑公受命以謀已者，遂執公欲置諸法，公卒能感以誠信，立解訟籐。^①

毒麵包案是香港開埠以後爆發的一件震驚中外的特大案件，然而坊間傳播的有關此案的事實多依據當時的英文報刊和英國議會的報告，故差異甚大，其最原始可靠的史料應該是《香港法例匯編》中的記載：

當1857年本港有專營糧食辦館生意兼製作麵包店號曰裕盛者，營業頗盛，全港西人官商，日常麵包多取給於該店，而海陸軍人尤多訂約包辦糧食。詎是年1月15日，該店製出之麵包，嘗以砒毒混雜製成，以故是日曾食該店麵包者不下三四百人，莫不同受厥毒，先後病發，全港騷然。猶幸藥力輕微，一經施治，旋即告痊，未嘗傷害一命。當道審查病源，知發自該店之麵包，立派大隊警察馳赴該店搜查，檢獲剩餘者，嗣經醫官檢驗，認定每麵包一磅含信石一安十之八分之一。核算是日麵包必曾混入信石重量約拾磅。當將店中夥伴全數拘捕，先後捕獲受下毒嫌疑者達40餘人。惟該店東主張阿霖，業於是日晨挈眷澳門，當道立懸賞1000元購緝，另有名譚阿才者亦在逃，乃併懸賞如數。同時特遣專輪赴澳，緝騎四出，緝拏歸案究辦。翌日澳警將張捕獲，押解回港，偵查結果，認定張阿霖及其父張某又譚阿才等其他8人有下毒嫌疑，應予從詳訊究外，其餘42人雖無預謀佐證，然亦暫行羈押，候全案訊結後發落。

該案提訊4天，至5日判結，按據事實，下毒已無疑義。惟除張阿霖為該店東主外，其父與其他八人均屬夥伴，與該店雖有關係，然下毒真兇為誰何，絕無確證，而誰曾經手買藥，亦無證據。就案情研究，則此此負犯罪責任者，當然為該店之麵包師傅。然究其下毒原因，不外兩端，或係受人賄賂希圖慘殺外人；或則因有私怨，暗置毒藥，希嫁禍張阿霖，並謀所以破壞該店之營業。查當日製作麵包之際，張尚在店，嘗入工場，但係為人所邀而非出於自動者。至關於動機，若細加研究亦不出兩途，張某設肆於英國治下地方，受英國法律保證，營業鼎盛，獲利不貲，誠如張氏之所為，人非至愚，決不出此，謂為貪賄，尚屬疑問，此在正面的觀察而言者也。但在反面觀察，張氏貿遷於港，為其本國當道者所嫉視，致獲罪於本國當道，生命危險堪虞，故不惜下此毒手以表白其絕無友敵之行為，且證明張於事發之日挈眷離港，若為先謀避地之計，則反面觀察之說，自有其成立之可能性也。嗣後張氏提出反證，張原籍中山縣，當日往澳，蓋為送眷還鄉，原擬事畢即返港，且彼曾在澳購買大幫麵粉為製餅之用，因事前彼與英海陸軍當局立約承辦大單餅乾之故也，有此事實，張氏潛逃之說已無根據。而當日張某乘輪往澳，又嘗以此種麵包食其兒女，兒女亦病，有此事實，張某主謀下毒及知情之說，亦已無可根據矣。

按察司曉吾（John Walter Hulme）發表意見，大致謂如以被告等果有下毒之所為，或曾主使下毒或為知情，罪狀當然成立。但當日張阿霖兒女在輪曾食同樣麵包，亦曾毒發致病，如事屬確實則張為不知情。遑論主謀，遑論真兇，自難成立罪狀。按檢察官所謂寧枉毋縱，殊失法律正義之旨，有礙法律之尊嚴云云。結果，陪審員以五對一之同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8頁。

意，審斷各被告無罪，按察司亦表示同意，即宣告被告無罪。

當2月5日被告等宣告無罪省釋出外，而總督約翰保陵（John Bowring），方秉承英廷命，草訂遞解出境法例，尚未版行。以被告等此次雖可不受法律處分，然有妨害地方治安之嫌疑，乃按據1857年第2號維持地方治安條例規定，簽發拘票，令警察重將各被告逮捕扣留，聽候英廷命辦理。5月7日，華人團體嘗召集大會，決議狀請總督，明令該案人犯一律遞解出境，以維治安。致張阿霖一名，因有債務關係須待清理，懇暫準留一二月，然後執行遞解出境。同日另有西人40名聯稟總督，請勒令裕盛店案內人犯自由離境，勿予遞解，張阿霖待清理債務，則並懇延緩其期限。^①

香港毒麵包案發生後，人們關注的是毒麵包案發生的原因、動機及政治背景，更多的人將此一案件與當時的中英關係甚至第二次鴉片戰爭都聯繫起來。其實，這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刑事案件，張氏族譜提供的資料“時工役眾多，日無暇晷，有某役因不慎誤投雜物於麵粉，西人售食悉皆暈眩顛倒”。應該反映了毒麵包案發生的真實原因。正因為此案是工人加工麵包時失誤而造成的人毒事件，並非有意投毒，所以最後該店的員工及東主張阿霖均判無罪，但由於影響過大，對當時的香港西人造成了很大的恐慌，故張阿霖亦被驅逐出境。人們在關注這一案件的同時，忽略了另一個很重要的史實，這位張阿霖或張亞霖就是來自於香山張氏家族的張霈霖。這位張霈霖不僅在澳門有商業，在廣州亦有店鋪，而其到香港發展後更成為香港早期開埠華商中資本最為顯赫的富戶之一，先是擔任孖刺士甸臣洋行總買辦，後又購置“羅素”、“三洛”、“美利”等三艘火輪開辦輪船公司，航行省港澳之間，成為開辦省港澳輪船公司的先行者。除此以外，他還在香港開辦“亨昌煤炭廠”、“裕昇洋貨店”和“裕成麵包店”。這個“裕成麵包店”就是毒麵包案中的“裕盛辦館”，實際上“裕盛”是“裕成”的錯誤翻譯，其名即為“裕成辦館”，現在中國近代史所提到的都是“裕盛辦館”，而不知其實為“裕成辦館”（圖1）。這個位於皇后大道上的“裕成辦館”是當時香港規模很大的一家辦館，專門承接香港外國人的伙食，幾乎全港的外國人日常所吃的麵包，都是由他們所供給，甚至駐港的英國軍隊的糧食，也是由他們包辦的。^②上引《特赦訴訟處分條例之源起》亦提到“彼與英海陸軍當局立約承辦大單餅乾”，^③能與香港政府簽訂英國海陸軍食品供應的大單，一方面反映了張霈霖深獲英國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商業實力及他在香港商業界的地位。一個麵包作坊僱員工人多達40、50人，也反映“裕成辦館”規模之大。英國人也稱他“營業鼎盛，獲利不貲”，^④據1857年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喬治·科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專訪報道，香港買辦通常有5,000—40,000美元的財富，其中兩人號稱擁資100,000美元。^⑤筆者懷疑這兩位擁有100,000美元的買辦一位是第一次鴉片戰船充當英船買辦的盧亞景，他到1850年代在香港也已經擁有房屋和店鋪超過100間，成為當時香港華人首富；^⑥另

① 馬沅編：《香港法例匯編》第1卷乙冊《特赦訴訟處分條例之源起》，香港：華僑日報有限公司，1936年，第9—11頁。

② 葉靈鳳：《香海浮沉錄》第16章《全港英人中毒的毒麵包案》，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第127頁。

③ 馬沅編：《香港法例匯編》第1卷乙冊《特赦訴訟處分條例之源起》，香港：華僑日報有限公司，1936年，第10頁。

④ 馬沅編：《香港法例匯編》第1卷乙冊《特赦訴訟處分條例之源起》，香港：華僑日報有限公司，1936年，第10頁。

⑤ George Wingrove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London: G. Routledge, 1858, p. 58.

⑥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9.

一位很可能就是孖刺士甸臣洋行總買辦出身的“裕成辦館”的東主張霽霖，他不僅在香港擁有兩個辦館，一家煤炭店，還有一家擁有三艘小火輪的輪船公司，估計他的財富超過100,000美元。在香港早期華商史的研究中，沒有任何人提及張霽霖在香港華商中間的地位，而張氏族譜提供的資料為我們增加了香港早期華商發展的又一重要史實。

圖1 裕成辦館



圖片來源：葉靈鳳：《香海浮沉錄》，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8頁。

毒麵包後審結後，雖然張霽霖被宣告無罪釋放，但由於該案造成的英人損失，他在香港的財產全部被凍結，還要付出巨額的賠償，加之被驅逐出境，所以他再次回到澳門。據《誥授通奉大夫沃生張公傳》稱：

經此小挫，復返濠鏡，創宏泰洋貨店，懋遷有無，若安平素。^①

可見，咸豐七年（1857）在香港遭到挫折後，張霽霖又回到澳門，並且創辦了“宏泰洋貨店”，繼續他的生意。有人根據報刊材料稱，張霽霖釋放的第二天後就乘船離港前往安南。^②此說有誤，張霽霖去安南不是咸豐七年毒麵包案結束後，而是在同治元年（1862）才從澳門前往安南，據《誥授通奉大夫沃生張公傳》稱：

越四年庚申，法人新得越南六省，有法三畫總兵官到澳見公，歡若平生，請代辦華艇數十號，公應命造辦。至同治紀元壬戌告竣，航海赴越，交卸法帥。以公忠厚，託以商事。公遂留越，徧遊境內，見埠甚蕭條，屋俱茅荻，因售機器，設元亨、利貞、乾美、坤美四窰，僱工印造甎瓦，興建樓房，埠漸稠密。時商賈初集，有海南人二百名揚帆徑至越鄙，因不諳法例被執，指為海盜，欲按律問鎗。公挺身力辦，其冤遂白，而二百人得幸生還。公在埠四十餘年，與法水乳交融，籌謀商業，莫不開創，宏濟華洋，負債何止億萬，而公概置弗問。其間栽培鄉族，護衛同種，法例苛而無知易犯，得公一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8頁。

② 葉靈鳳：《香海浮沉錄》第16章《全港英人中毒的毒麵包案》，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第127頁。

言而萬事解釋，旅越之人，咸嘉賴焉。至如會館，永蠲常稅，義地概免徵抽，公之力為多，至今猶口碑載道。^①

咸豐十年（1860），法國佔領越南南圻六省，並派總兵官到澳門來見張霈霖，邀請他在澳門代造“華艇數十號”。因為此時澳門的造船工業正處於長足發展時期，^②所以越南的法國殖民者亦慕名而到澳門來訂購船隻。同治元年（1862），張霈霖造船事竣，並親自押送船隻抵達越南西貢，“交卸法帥”。法國軍方見張霈霖忠厚友信，遂將法國在越南的商務委託於霖。於是，張霈霖遂留居越南，除經辦法國人的商務外，又設立“元亨、利貞、乾美、坤美四窯”，用機器製造磚瓦來興建樓房，發展越南西貢的城市建設。張霈霖在越南居留近40年，與法國人關係十分融洽，被稱為“水乳交融，籌謀商業，莫不開創”。在其71歲壽辰時，在越南的法國人均為之慶賀：

凡法之衙署、洋行、學堂、兵廠皆升旗誌慶，給假上壽，有如其國家之慶典者。時法帥李過禮奉到其伯理璽天德祝辭，錫以頭等寶星，親為頒至，舉國歡呼慶賀，人以為榮。^③

由於張霈霖與越南法國人的關係極為密切，遂使張氏家族在越南的商務也日漸興旺。他還利用其與法方的友好關係，為“安南堤岸（指西貢）穗城會館”和“義地”向法方申請免稅，使旅越華僑大獲其便。張霈霖後，其六子張振驥、七子張振昌、八子張振拔都先後去安南經商，死後有的葬海防埠義地，有的葬堤岸穗城義地。^④其侄張振碩和張燦綿也先後去安南，並葬於西貢堤岸義地。^⑤

三、晚清澳門維新運動中香山張氏家族的“南屏二張”

南屏二張指的是香山縣南屏鄉張氏家族二房對揚公和翹揚公兩支的張壽波和張仲球。張壽波，又名揚聲，號玉濤，香山張氏二房兆沖公房十九世孫，其生父為張家桓，諱有良，號性田，為國學生，曾誥授奉政大夫。^⑥壽波生於同治七年（1868），為張家桓的長子，兩歲時過繼給其伯父張家曜。張家曜，諱有甲，號星槎。^⑦同治九年（1870）三歲時因其祖父張益階“久商閩省，經營茶業”，故遂隨祖母趙太夫人居於福州。^⑧張益階，諱以謙，名建煜，益階為其號，國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8頁。

② 湯開建：《被遺忘的工業起飛：澳門工業發展史稿（1557—1941）》，澳門：澳門文化局，2014年，第52頁。

③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9頁。

④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2冊卷2《兆隆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68頁。

⑤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2冊卷2《兆隆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69—70頁。

⑥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0頁。

⑦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0頁。

⑧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張君玉濤事略》，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0頁。

學生，敕授登仕郎，誥授朝議大夫候選分巡道。^①張益階福建經商時，次子張性田、三子張鑑田隨父在閩。張壽波天性聰穎，舉動若成人，祖父母甚鍾愛之。同治十三年（1874）七歲時啟蒙受學，師從番禺名儒胡箕疇。張壽波幼年讀書時，過目能誦，有神童之譽。^②光緒四年（1878）六月，其祖父在福州去世，遂隨其生父張性田和叔父張鑑田扶柩歸里。光緒十二年（1886）十九歲時，補弟子員進香山縣學。光緒十六年（1890）二十三歲時，補增生，自是益求進取。^③光緒十七年（1891）二十四歲時，以廣州府香山縣學附生參加鄉試，高中第七名舉人。^④其與康有為的關係大概始於此時，據潘叔璣《萬木草堂弟子姓名憶述》稱康有為弟子百餘人中有香山張玉濤名列其中。^⑤筆者估計張壽波當時在廣州時曾到萬木草堂聽過康有為的講學，故亦被列為康門弟子。光緒十九年（1893），其生父張性田去世，張壽波居家守禮。^⑥

日本人田野橘次稱張壽波“張氏，廣東省香山縣之豪族也，家有財巨萬”。^⑦桑兵先生稱張壽波“出身香山縣沙尾鄉豪族，權理該族的張續光堂，家財巨萬”。^⑧桑兵對此未注出處，查《知新報》稱：“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日張緒光堂權理會事子孫心湖、仲球、壽波謹佈。”^⑨心湖，即張有韜，名家振，為張建詩之長子；仲球，即張有貢，名家賜，為建詩公之次子，屬翹揚公一支；壽波，即張玉濤，名揚聲，建煜公之孫，屬對揚公一支。實際上，心湖（有韜）和仲球（有貢）均較玉濤長一輩，為張玉濤之族叔。《知新報》原報紙排版因輩分之故將有韜和有貢並列，並以小字處理，而玉濤則單列一輩，為大字。非常明顯，壽波雖為大字，並不表明張壽波之重要。權理南屏張氏家族之“張緒（桑兵書誤為續）光堂”者是有韜、有貢及壽波三人，而且以心湖排第一，仲球第二，壽波第三。張緒光堂在《知新報》上出現過兩次，而張氏族譜卻記載了該堂興建的原委，該堂興建首倡於張文岳，捐銀二千七百餘兩，而張在崧（疊揚）亦不惜重費，繼捐五千二百餘兩，道光十年（1830）開始興建，十一年竣工。“其規制之盡善悉文岳所經畫焉，而潘明經為之顏其堂曰：緒光”。^⑩可見，緒光堂實為南屏張氏之祖祠，由於家族祠堂一般都要對其家族祖業財產進行管理，所以張緒光堂有一個理事會對張氏家族祠堂之產業進行管理。前引《南屏圖》稱南屏“地居海濱，人多貧苦”，直到道光以後，南屏鄉人多經營洋務，遂出現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20頁。

②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張君玉濤事略》，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0頁。

③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8頁。

④ 中山市檔案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8《文教·廣東鄉式題名錄（光緒辛卯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3頁。

⑤ 潘叔璣：《萬木草堂弟子姓名憶述》，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5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0頁。

⑥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0頁。

⑦ [日]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運動》，上海：新智社，1903年，第104頁。

⑧ 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第10章《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12頁。

⑨ 《香山沙尾鄉張氏大同戒煙會約章》，《知新報》第59冊“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788頁。

⑩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祠宇譜，清懷張公祠堂記》，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頁。

豪門巨富，南屏張氏即為其一。南屏張氏經商致富始於十五世張文岳公，張文岳（輔邦）在廣州經商，“居奇致富”，後由其姪張在崧（疊揚）主理其家族商業。^①後文岳公之孫張式軒（建詩）到香港發展，^②另一孫張益階（建煜）則在福州經商，家族商業更加發展，而南屏張緒光堂也就成為上述兩支張氏家族產業管理的堂號。張心湖和張仲球均為張建詩之子，而張壽波則為張益階之孫，因張益階之子、張壽波之父張性田已經去世，故代表張益階這一支與張心湖和張仲球三人共同管理張緒光堂，而因為後者長一輩，故名列於前。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同善堂1893年創建的時候，張益階的次子和張壽波的叔父張鑑田即為當時的創始人之一。^③張鑑田生於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十六日，此時張鑑田43歲。^④張鑑田能成為同善堂的創始人，必為澳門的富裕紳商，由此亦可說明，對揚公一支應該在1890年代之前已經遷入澳門，張壽波也應該是在這一時期遷入澳門的。張壽波既師從康有為，思想較新，接受西學，很早就學習了日文，據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知新報》材料，他為日本東亞同文會會長高橋謙的演講充當翻譯，^⑤可見他的日文水平很高。光緒二十一年（1895）公車上書時又聯名參與，^⑥光緒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十一日在《時務報》發表《歐亞氣運轉機論》，宣傳和介紹西學，文中還提出了“君民一源說”，該文又刊載於《清經世文三編》之中。^⑦其後又參入康梁變法中的多項活動，所以鄭壽耆稱：“戊戌政變，君以從遊康南海，掛名黨籍。”^⑧成為晚清澳門地區十分重要的維新派人士。

張仲球，諱家賜，又名有貢，仲球為其號，世以號行。張仲球為香山張氏二房兆沖公十八世孫，張建詩次子，國學生，生於同治九年（1870）。^⑨其兄張心湖生於同治五年（1866）十月初十日，為張建詩長子，出自翹揚公一支。^⑩據《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載：

-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岳之張先生行述》，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4頁。
- ②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張式軒公行述》，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6頁。
- ③ 湯開建、吳志良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1893年2月25日第8號”，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211—212頁。
- ④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0頁。
- ⑤ 《知新報》第97冊“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401—1402頁。
- ⑥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第1章《“公車上書”考證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87、90頁。
- ⑦ [清]陳忠倚：《清經世文三編》卷73《洋務》5，清光緒二十四年寶文書局石印本，第2—4頁。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413頁，稱：“主權在民思想，創生於清末，實脫胎於中國固有之民本論。代表人物有吳芝瑛、何啟、胡禮垣、張壽波、陳玉樹、康有為、李振鐸等人。”不知為甚麼王爾敏先生將張壽波之名排到其師康有為之前，這種敘述序列恐為不妥。
- ⑧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送張孝廉玉濤出家》，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2頁。
- ⑨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2頁。
- ⑩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2頁。

光緒十八年，澳紳張心湖太夫人疾，聘西醫孫逸仙博士來澳診治，已而藥到回春，

神乎其術。於是。榮祿公（盧九）挽其留澳，薦以鏡湖醫院醫席，為鏡湖西醫之首任。^①

光緒十八年即1892年，這就是說，在1892年時南屏張氏家族翹揚公一支已經移居澳門，張心湖、張仲球均出自這一支。這時張心湖26歲，張仲球22歲，既被人稱為“澳紳”，已反映其家族在澳門的地位。上面這條資料既反映澳門張氏家族很早就與革命先驅孫逸仙有所接觸，而且該家族在1892年時就聘請西醫來家給其母親治病，更可以反映他們對西學的認同與接受。張仲球與張壽波雖為叔姪兩輩，但在實際年齡上，張壽波還年長張仲球一歲，應該屬於一起求學長大的同里族人。值得注意的是，張壽波很早學習了日文，而比壽波小一歲的張仲球也精通日文，原生學舍創辦後，他從日文翻譯了《蒙學圖說》一書作為教材。^②因此，筆者懷疑此叔侄二人是在同一時間學習日文的，二人不僅為同里同族，且有同學之誼，故二人關係十分密切。張壽波由於較早接受康有為的影響，很快就成為了當時維新運動的核心人物。而張仲球亦是較早接受西學的先進人物，當時能夠精通日文的晚清秀才，應該是已經接受西方新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所以他能與張壽波沆瀣一氣，配合張壽波一同工作。從1894至1904年的十年期間，兩人共同在澳門發起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社會改良新事業，給沉寂的晚清澳門社會吹來了陣陣新風，造成了極大影響，成為了這一時期澳門社會的風雲人物。

（一）原生學舍的創辦及有關問題考辨

光緒二十年（1894），張壽波與其族叔張仲球以及同里陳蔚秋、陳筱江在澳門創辦原生學舍。據張仲球自己的說法稱：

前清甲午之役，國人知朝政日非，群起圖強。於時，陳君筱江、陳君蔚秋、余與觀本（張壽波）四人，乃創立原生學舍，習英日文字。^③

鄭子健《張君玉濤事略》則稱：

癸巳冬，本生父性田公棄養，君家居守禮。乃於次年，與其族叔仲球，同里陳蔚秋、陳筱江諸君，創設原生學舍於濠鏡，研習東西文字。^④

以上四人，除張壽波和張仲球是香山南屏人外，陳蔚秋和陳筱江也是南屏在澳門商人。關於澳門原生學舍創辦的詳細情況沒有其他資料，但據冼玉清的回憶稱：

原生學會：有富人張心湖者，購地於荷蘭園街，建別墅四，原生學會維新志士談學藝、講政論，多出於此。而天足會、戒煙會、剪髮會等，亦借此地為會所。^⑤

原生學會當即原生學舍，張仲球和鄭子健的資料均未提及張心湖創建原生學舍，而冼玉清作為維新時期澳門學塾的學生所記張心湖實為原生學舍的創辦人之一，而且還明確說明原生學舍就在荷蘭園街，是由澳門富商張心湖在荷蘭園街購地建四座別墅而修建的學校。觀圓法師（張仲球）

① 楊振熊、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寫：《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澳門民政總署藏1959年稿本，無頁碼。

② 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207頁。

③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送觀本師出家》，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1頁。

④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張君玉濤事略》，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0頁。

⑤ 冼玉清：《澳門與維新運動》，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6卷《廣東政海拾遺》，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9頁。

《送觀本師出家》更詳細記錄了原生學舍的地址稱：“妙持（張壽波子樾滂）乃在澳荷蘭園十三號原生學舍對門出世。”^①冼玉清的說法亦可獲陳國光《節婦吳太孺人傳》佐證：

時壽波與其族叔家振、家賜，界涌陳朝宗及國光等倡辦禁煙、不纏足等會，又創原生小學堂於濠鏡。^②

家振即張心湖，家賜即張仲球，此處將原生學舍稱為原生小學堂，可見陳國光亦認為張心湖是原生學舍的創建人之一。又《嶺南學生界》之《澳門張氏家塾》稱：

張君兄弟，嘗於戊戌年在澳與同志創辦原生學堂。^③

這裏的張君兄弟指的就是張心湖和張仲球兩兄弟，張心湖為長，張仲球為次，均為澳門之富商。因此，我們可以判斷，澳門鏡湖學舍的創辦除了張壽波與其族叔張仲球外，還有一位南屏張氏家族成員澳門富商張心湖。馮自由認為張壽波創辦的原生學舍“大得穗田之助”，^④桑兵亦稱張壽波倡辦學校大得其（何穗田）助。^⑤馮自由這一說明並無任何證據，如果從當時張氏家族在澳門的勢力和財富來說，張心湖、張仲球兄弟和其姪張壽波創辦一所幾十人的學塾應該不需要何穗田資助，所以我認為馮自由所得消息應該是澳門之誤傳，這從張仲球後來一人投數千金創辦張氏家塾即可證明。

關於澳門原生學舍創辦以後的情況，資料記述不多。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897年10月16日），《知新報》刊登了“原生學舍來稿”《日本未足進步論》，該文“譯西曆七月十七號《時事新報》”；^⑥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98年1月3日），《知新報》刊登了“原生學舍來稿”《論德國舉動》，該文“譯十一月二十四號《時事新報》”；^⑦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知新報》刊登了“原生學舍來稿”《論實施條約要旨》，該文“譯西十二月十四號《時事新報》”。^⑧從這三份原生學舍發表在《知新報》上的稿件來看，可以反映出該學舍創辦後確實是在“研習東西文字”。《時事新報》為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於1882年創辦的介紹西學的近代日文報刊，原生學舍從該報中翻譯文章，刊登在《知新報》上，輾轉宣傳介紹西學。原生學舍的兩位創辦人張仲球和張壽波都精通日文，這幾篇原生學舍來稿有很大機會均是二張之譯作。他們將自己從日本學習來的西學精華又輾轉通過《知新報》介紹給國人。張仲球還翻譯了《蒙學圖說》二卷，並用該書作為原生學舍的教材，這些均應是澳門華人教育中最早對西學的宣傳與運用。在《蒙學圖說》上還標明有“光緒戊戌原生學舍石印本”，^⑨這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1頁。此語還可證明當時張壽波的家也在荷蘭園街。

②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耆壽》，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頁。

③ *The South China Collegian*（《嶺南學生界》），Vol. 1, No. 8, The Collegian Stock Company, Canton, China, 1904, p. 22.

④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89頁。

⑤ 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第13章《保皇派與港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98頁。

⑥ 《知新報》第34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381—382頁。

⑦ 《知新報》第42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511頁。

⑧ 《知新報》第43冊“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528頁。

⑨ 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207頁。

就是說原生學舍創辦至少有四年時間，直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該學舍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時張壽波受康有為的影響已赴北京參加公車上書，在1,555名舉人的聯名上書中有張壽波名列其中。^①可見，原生學舍創辦後應主要由張仲球主理。澳門華人教育雖然很早即有社學和義學之置，但這些社學和義學均屬於中國傳統的鄉村教育，而原生學舍這種採用西式教材並學習西方文字的近代西式教育，卻是澳門近代華人教育中的首創，實為澳門近代華人教育之嚆矢。

（二）發起和創辦澳門不纏足會

禁女子纏足是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人士發起的最為重要的社會改良運動內容之一。光緒九年（1883），康有為與區諤良共創南海不纏足會，時為中國不纏足會之始，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與其弟康廣仁“創辦粵中不纏足會”。^②光緒二十三年（1897）5月2日，梁啟超和譚嗣同等人在上海試辦“不纏足會”，並在《時務報》上刊登《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張壽波是倡辦董事之一。^③緊接，張壽波又從上海趕回澳門，與張灝、張壽活、吳節薇、何廷光、陳桐若、陳蔚秋和康廣仁等共同創建“澳門不纏足會”，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1897年5月22日）的《知新報》刊登了該會的章程：

澳門不纏足會別籍章程：此會專為廣開風氣而設，如有同志君子，既具知識，而未敢自信，能永遠遵守總會全例者，請暫注於此籍。此會本意專以勸導女子不纏足為主。男子擇婚娶婦，亦以不纏足為主。注籍之始，各宜於籍貫注明年歲，及現在妻妾子女幾人，纏足與不纏足。凡會籍中人，自八歲以下，一律均不許纏足，如年過九歲，已纏足不能放者，須於本籍注明，如總會之例。娶纏足之女，如係本會，已報明者聽，若會外人未經注籍者，須邀同通籍報明，方算合例，婚娶如有不合例者，須先到本會將名字報除，如不報除，作為有意干犯本會條例。凡有意干犯本會條例，如私纏足，私娶纏足婦等事，本會即將其名標出，作為化外人看待，凡會中人不得與化外人為婚。本會立法不以嚴例苛責人，祇求各人堅其信心，實力遵行，革此澆俗，如有信心未堅，遵行不力者，慎勿漫登此籍。本會所發冊籍，俱由倡始各同志集資辦理，同會注籍諸君，均不取冊金。本會無甚功德於，不敢領受捐，惟上海總會，他日有倡設女學校、婦孺報、婦嬰醫院、恤嫠局等善舉，需費繁浩，好善君子，如能解捐，請助總會。同會中有能捐助總會，興辦一切善舉，則總會所設利益，本會當保令一體霑受。此會辦理以三年為率，三年以後，風氣漸開，民智漸廣，同志諸君子，儘可樂心附入總籍，此會不必另設。^④

當時參與創辦的人員共有113人，其名單如下：

張壽波、張灝、張壽活、吳節薇、何廷光、陳桐若、陳蔚秋、康廣仁、張有韜、張有貢、吳文暢、陳國光、柯祖賡、賴際熙、劉光廉、徐嶽、陳芳仁、余國靄、徐述堯、曹連壽、曹應壽、蕭藻旒、鄧竹溪、楊祖守、楊訓聯、楊開疆、陳傳善、陳朝宗、

①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第1章《“公車上書”考證補》，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87、90頁。

② [清]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1頁。

③ 《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時務報》第25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1897年5月2日）”，台北：文化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1662—1665頁。

④ 《知新報》第19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46—147頁。

楊呈祥、潘飛聲、陸慶清、陳乃潤、陳華樞、何天柱、葉成珍、楊錫泉、楊祝山、張有年、梁郁明、張馨田、朱 淇、張華袞、吳振鵬、梁星堂、林沛三、鮑奏麓、朱景坨、王 吉、吳繡谷、柯成之、容學華、陳耀鍇、張鳳儔、李暢能、李希鴻、陳緯垣、溫銘閣、梁松千、陳彤軒、陳吉垣、蔡世康、柯眷之、柯行之、陳兆樑、吳少葦、陳衍芳、陳植彝、吳耀堂、區桐呂、王龍田、楊旭初、陳直垣、陳桂籍、曾達之、陳若霖、陳季和、陳旭垣、陳公澤、黃滌波、黃紫雲、何瑞增、楊熾生、劉玉田、尤 列、張煥周、林連生、陳樂軒、吳和琛、吳甯琛、郭雨三、鄭東里、黃拔臣、高 飛、蕭雲山、吳屋籌、吳應揚、程道元、鄭壽耆、杜清貽、韋朝選、何子銓、杜文祥、廖鳳舒、楊祖孔、容達楷、葉侶珊、陳步墀、戴 荃、宋子衡、宋照寰、宋展鵬、宋次鵬、李盛鳴、鄭仲賢、張 辛、陳士廉、鄭鳳威。^①

在這113人中，張壽波、張有韜、張有貢、張有年、張灝和張馨田等均出自南屏張氏家族。張有韜，即張家振，號心湖，為張仲球之兄；張有貢，即張家賜，號仲球；張有年，即張家權，號蕙暄，曾任福州府補用福清縣知縣，^②為張仲球堂兄，1896年曾出任鏡湖醫院值理，他們家族在澳門的堂號為張蘊福堂。^③張有年為張建勳次子，生於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十三日，屬彥揚公一支，在澳門有自己的商號張蘊福堂，1890年代也遷入了澳門；^④張灝，疑為張有灝，即張家閱，曾在天津太古洋行其舅鄭翼之處謀生；張馨田，即張藻聲，名世允，號馨田，為張仲球堂姪。^⑤據《知新報》第66冊刊載有廣東不纏足會進、支款列，^⑥“澳門不纏足會”實為廣東各會所得會籍資料之匯集總處，可知“澳門不纏足會”是廣東地區不纏足運動首要的策動機關。澳門不纏足會發起人為南屏張氏家族之張壽波，而該家族又至少有6人投入到澳門不纏足會的創建，足以說明香山南屏張氏家族為推動廣東地區不纏足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發起和創辦澳門戒鴉片煙分會

19世紀末，在中國發起的戒鴉片煙運動，應該也是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在其維新變法運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除舊佈新的方案之一。光緒二十四年（1898）5月，維新派人士徐勤在日本橫濱發起成立戒鴉片煙會，並在澳門《知新報》上發表《戒鴉片煙會序》和《戒鴉片煙會章程》。^⑦當

① 《知新報》第19、20、22、27、30、44冊，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47、168、200、281、329、556頁。

②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29頁；[民國]厲式金：《（民國）香山縣志續編》卷9《選擇》附《仕宦》，中山文獻第7冊影印民國十二年刊本，第2339頁。

③ 澳門鏡湖醫院編：《鏡湖醫院徵信錄》上，廣州大同印務局，1922年，第15頁。徵信錄將張有年的號“蕙暄”誤為“蕙睦”。

④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29頁。

⑤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1、37頁。

⑥ 《知新報》第66冊“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913頁。據其捐款名單，張氏家族張有韜、張仲球和張華岡（疑即張華袞）均有捐款，其中張有韜捐銀最多，共捐七兩二錢。

⑦ 《知新報》第51冊“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653—654頁。

時剛創辦完澳門不纏足會的張壽波又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帶頭發起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表示響應和支持，並設立澳門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共9人，張壽波名列為第一董事，其他分別為：

張壽波、陳士廉、麥致祥、何廷光、劉楨麟、梁福田、陳繼儼、李盛銘、鄭仲賢。^①

張壽波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董事會後，首先和族叔張有韜、張仲球於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前後在返回家鄉南屏時發動全體族人成立“沙尾鄉張氏大同戒鴉片煙會”，訂立了戒鴉片煙會約章，詳細規定了無煙癮的子弟、有煙癮的子弟、想戒煙癮的子弟的約規，以防禁止煙癮子弟吸食鴉片，並幫助想戒煙癮的子弟戒除煙癮。其章程刊登在六月初一日（7月19日）的《知新報》上：

香山沙尾鄉張氏大同戒鴉片煙會約章：中國戒鴉片煙會起點於橫濱，內地應之，然皆自鎮埠通商口岸、紳商鱗萃之區舉之，未有行之於鄉族者，有之則自沙尾鄉張氏始。張氏為香山名族，凡千數百人，吸鴉片者殆不鮮，而一二人倡之，闔族和之。數日間克成斯會。嗚呼！何其捷也。其約章周密圓通，二美兼備，尤為處鄉族之良，則故亟錄之，以為繼起者勸。……凡既入會者，以後新丁均一律遵約入會，永遠恪守勿替。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日香山張緒光堂合族公訂。

特款：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念五日以前，清懷祖祠族內，已有烟癮之人，若能實心實力，將烟癮戒斷者，到會內董事掛名，限三個月內查確非虛，則獎給該人勵志銀拾大圓，並該人之身後，另加給帛金銀拾兩，此款由本會好善者捐出，若有本鄉殷實人，拒保該斷癮之人，則會內董事，必須將此款交出，決不食言，倘該人斷癮之後，又復上癮，則所曾領之銀，必須責擔保者加倍交還會內，及罰除該人祺壽堂帛金，革去本祠祭胙，以示懲警。倘殷富之人，自行戒烟，斷癮後，不願領此款者，則本會提出此款，作為該人解捐，標明祠壁，撥存會中，以為辦事之用。此款章程為現在的當有烟癮各子弟而設，如在前有癮，已曾戒斷者，不在此例。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日張緒光堂權理會事子孫心湖、仲球、壽波謹佈。^②

緊接着，又於五月二十一日（7月9日）在《知新報》上發表《澳門戒鴉片煙分會序》，宣佈澳門戒煙分會正式成立。^③不久設立在橫濱的戒鴉片煙總會也遷至澳門《知新報》館辦公，澳門成為中國戒鴉片煙會的領導機關。^④到八月二十一日（10月6日），澳門戒鴉片分會又增加5位董事成員，分別是陳蔚秋、張華岡、關蕙田、趙潔成和趙士役。同時還公佈了該會的創始會員：

張仲球、張壽坤、張壽鋌、張建堂、張建圖、張建升、張建倫、張建丕、張建通、張建錦、張建品、張家權、張家祥、張家全、張家振、張家勤……

① 《知新報》第52冊“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684頁。

② 《知新報》第59冊“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787、788頁。

③ 《知新報》第58冊“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767頁。

④ 《知新報》第59冊“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799頁。

譚景塗、譚景墾、譚貞元……

何悅圖、何恒圖……^①

此處張建堂當為南屏張氏家族二房兆沖公房的張仲球，諱家賜，名有貢，屬翹揚公一支；張建棠，諱以勸，號碧溪，屬珮揚公一支；張建圖，名應良，諱肇庭，屬顯揚公一支；張建升，諱以永，號日初，屬觀揚公一支；張建倫，諱以佐，屬賡揚公一支；張建丕，名翼鵬，號彬宜，屬對揚公一支；張建通，名以豁，號貫成，屬翹揚公一支；張建錦，名以餘，屬現揚公一支；張建品，名廷光，號玉林，屬俊揚公一支；張家權，諱有年，號蕙睦，屬彥揚公一支；張家祥，名有鍊，屬翹揚公一支；張家全，屬奕揚公一支；張家振，名有韜，號心湖，屬翹揚公一支；張家勤，名有創，屬惠揚公一支。^②如果加上張壽波，香山張氏家族發起和創辦澳門戒鴉片分會的董事和創會成員共有15人，佔全部成員的50%，可見該家族對澳門戒鴉片煙分會的成立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四）原生學堂和原生書藏及有關考證

關於原生學堂和原生書藏的創辦，鄭子健《張君玉濤事略》記載稱：

乃於次年，與其族叔仲球，同里陳蔚秋、陳筱江諸君，創設原生學舍於濠鏡，研習東西文字。並立戒菸會、戒纏足會、演講團、閱書社等。翌年，又創原生學堂、原生書藏，諸君皆一時俊彥，轉移風氣，收效自宏。^③

這就是說，原生學堂和原生書藏創建的時間應該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創辦澳門戒鴉片分會後。陳國光《節婦吳太孺人傳》亦稱：

時壽波與其族叔家振、家賜，界涌陳朝宗及國光等倡辦禁煙、不纏足等會，又創原生小學堂於濠鏡。^④

《嶺南學生界》之《澳門張氏家塾》稱：

張氏家塾，在澳門南環，乃香山張心湖君、張仲球君所設，以訓課子女、弟妹者也。張君兄弟，嘗於戊戌年在澳與同志創辦原生學堂。惟時風氣初開，生徒濟濟。旋以政變之故，各人方畏新如虎，來學者稀，原生學堂遂於庚子年停辦，而張君因此創家塾焉。^⑤

① 《知新報》第67冊“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929頁。

②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2、20、25、21、23、24、29頁。上引文中的張壽活、張壽坤、張壽鋌、張華袞、張鳳儔和張煥周等張姓族人均為香山張氏，但在《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中查不到他們對應的名諱字號，很可能不屬於南屏張氏家族，如張壽活雖稱香山人，卻有人說他是黃旗都人。《農蒼》稱：“第三冊《農學論》，香山張壽活著。此人是黃旗都農會成員，是受過近代農業科學教育的人。”載吳建新《嶺南歷代農、動、植物志敘錄》，華南農業大學農業歷史遺產研究室編：《農史研究》第9輯，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年，第126頁。

③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張君玉濤事略》，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0頁。

④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耆壽》，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3頁。

⑤ *The South China Collegian*（《嶺南學生界》），Vol. 1, No. 8, The Collegian Stock Company, Canton, China, 1904, p. 22.

此處有一點值得注意，《張君玉濤事略》涉及原生學堂創辦時，並沒有提到張心湖（即張家振），而且《節婦吳太孺人傳》和《嶺南學生界》都稱張君兄弟創辦，即張心湖（即張家振）和張仲球兄弟創辦，而沒有張壽波。其實，在張氏家族中，張心湖和張仲球是張氏家族上一代的掌門人，而張壽波又晚一輩，在他們家族的商業活動中，張緒光堂應為其主要產業，而且張緒光堂第一號掌門人為張心湖，第二號掌門人為張仲球。所以，要拿出家族的錢財來創辦學堂，首先應該是張心湖和張仲球，張壽波不過是參與者而已。後人因張壽波在康梁變法中名聲很大，後期出家成為觀本法師，在佛教界影響更大，所以將很多事情都首冠於張壽波頭上。

1904年完成的《澳門張氏家塾》一文明確稱原生學堂創辦於戊戌年，即光緒二十四年（1898）。田野橋次稱：

張氏，廣東省香山縣之豪族也，家有財巨萬，自創學校於澳門，名原生學堂，以教育男女學生四十餘人。北京政變之後，政府忌之，此校亦見解散。張氏之思想為博愛主義，彼為日本赤十字社之一會員，而欲設置同社於支那，志願甚強。彼又為女子教育之熱心家，且又為日本土地復權同志會之一員。蓋彼非革命家，而實溫厚之教育家也。^①

田野橋次介紹了原生學堂的學生規模，有“男女學生四十餘人”。這在當時的澳門來說，應該是一所具有相當規模的學校了。而且該學堂還招收女生，男女同堂，這不能不說在當時的澳門華人教育中確為開風氣之先者。與之同時創辦的“原生學藏”，很可能就是原生學堂的藏書處，也應該就是這個學校的圖書館。但關於這個學校的老師沒有專門介紹，筆者認為原生學堂應該是在原生學舍的基礎上發展成立的，原生學舍之宗旨就是研習東西文字（英日文字），那就是說，這個學校除了教中文外，還可能要學習英文和日文，而且當時在澳門的日本人田野橋次很可能就是原生學堂的日文教師。據《知新報》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一日（1899年10月5日）記載，八月二十七日（10月1日）澳門同仁祭祀孔子：

約於原生學堂舉行焉。是日也，合學堂員董、茶談社員、東文館留學生、知新報館執筆人，凡數十人，率原生學堂學童亦數十，此外，同志來集者亦以十數，以下午鐘三鳴時行禮。^②

從此處記載可以看出兩點：第一，原生學堂具有相當大的規模，至少該校擁有一間可以容納百餘人的會堂；第二，這個原生學堂除了學習西方文字以外，還進行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也行使中國學塾祭拜孔子的儀式。十分可惜的是，張氏叔侄在澳門創辦的這麼一所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兼容中西、男女同堂的近代學堂僅僅只開辦了兩年——由於康梁變法運動及庚子勤王的失敗，至庚子年（1900）該校就被迫停辦。^③

① [日]田野橋次：《最近支那革命運動》，上海：新智社，1903年，第104—105頁。

② 《知新報》第101冊“光緒二十五年九月初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464頁。

③ [日]田野橋次：《最近支那革命運動》，上海：新智社，1903年，第104頁，認為：“北京政變之後，政府忌之，此校亦見解散。”此語不確，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以後直到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0月1日），澳門原生學堂學生還參加了祭祀孔子的活動，可見到10月份還沒解散。據*The South China Collegian*（《嶺南學生界》），Vol. 1, No. 8, The Collegian Stock Company, Canton, China, 1904, p. 22，稱：“旋以政變之故，各人方畏新如虎，來學者稀，原生學堂遂於庚子年停辦。”這就是說，政變以後原生學堂的學生減少了，而到庚子年（1900）這個學校才真正停辦。

（五）發起和創建澳門鏡湖茶談社

鏡湖茶談社，又稱澳門茶談社，應該就是《張君玉濤事略》中提到的“演講團、閱讀書社”。^①戊戌政變後，1899年張壽波、徐勤和田野橘次在澳門發起和創建鏡湖茶談社。據田野橘次稱：

鏡湖茶談社者，廣東革新派之團體也。其發起者為張玉濤、徐勤及予三人。此乃合康有為派、基督派及張玉濤派三者而成立也，其勢力在廣東省實為最著。而其綱領有二：一同志結懇親，二研究時局問題。觀以上二者之宗旨，絕無舉革命之思想，又無亟速之運動，然由其外部觀之，或大有不穩之狀。予之諸友人互來相告白，革命在近，子其圖之。予固希團體之鞏固，將以唱革命，然恨百餘會員，有革命之思想者甚少，故予常欲主張革命，而仍有所躊躇也。本會之組織亦無一定，為會員者，但每月以十五錢即中國百五十錢為會費，蓋為茶金也。每十五日集會於原生學堂，各述自己之說，會員中雄辯家為何易一，動大顏而吐珍說奇論。又有基督教主義廖德山，盛唱宗教的自由平等說。^②

鏡湖茶談社正式創建的時間應該是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99年3月2日）之前，^③而澳門茶談社規條則正式公佈在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1899年8月26日）的《知新報》上：

澳門茶譚社規條：一、修學將以養源，修辭將以養性，是故麗澤之義，原於濟識，珠玉之重，不如贈言，群哉同人，習朋於朔望日午；二、星球同界，方趾同類，識智精越，皆為道華，勿論中外，皆得公舉為演說主；三、宣微竅幾，溲渤不遺，疏通知遠，足見明達，百家支流，請縱意宣發無量；四、諸天之生，根於熱點，萬化所動，視其光原，同志講勸，期激厲爾，窈言無益，請緘茹勿道；五、星河泰岱，不極高堅，勿毗一是，足規虛已，請受聽者問辯；六、樹于有禮必有艾，辭者立言，辯者毋坐，聽受既畢，乃起申所疑；七、雒蜀異論，朱陸殊軌，奮踏偶過，勿存於懷，若適所從，主之公論；八、相如思澀，韓非口吃，腦智速率，信非齊一，屬辭比事，寬以時日，置博議錄，謹登偉筆；九、動諮有謀，去而勿遷，不即颺摧，更俟後會，置疑問錄，儲所商於篇；十、漢代博士，罔不署名，泰西舉賢，勿限承直，置月記冊，以稽至止；十一、他山愛資，緣義有類，懷彼湛蘭，惟集成益，敬備客座，願虛賢席；十二、國際團體，奮於一人，聖學基礎，端於幼稚，盛強之效，深冀後進，是日相集，率原生學堂諸子與焉。^④

這個茶談社應該就是設在原生學堂之內，上引文稱“是日相集，率原生學堂諸子與焉”，表明茶談社的成立就在原生學堂內。田野橘次稱茶談社是集三派之勢力，即康有為派、基督教派和張玉濤派，徐勤、何樹齡（易一）明顯是康有為派，廖德山當然是基督教派，而將張玉濤列為康有為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張君玉濤事略》，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0頁。

② [日]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運動》，上海：新智社，1903年，第103—104頁。

③ 《知新報》第79冊“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110—1111頁。

④ 《知新報》第96冊“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388—1389頁。

之外的單獨一派，很明顯指的是澳門富商中同情和支持維新運動的這一股勢力，張玉濤為其代表。據田野橘次的介紹，茶談社的會員有百餘人，每月十五日在澳門原生學堂集會一次，每個會員每月要交150文錢的會費。該社的宗旨一是團結懇親，二是研究時局，主要是定期集會，舉辦演講。第一期演講為田野橘次的《天才論》，後刊登在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99年3月2日）的《知新報》；^①第四期演講為仰光李竹癡的《人種興亡論》，刊登在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1日）的《知新報》；^②第十四期演講為日本東亞同文會會長高橋謙的《論國家盛衰與人才消長相關之理》，“茶談社員張玉濤譯意”，刊登在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1899年8月26日）的《知新報》；^③其後還有日本松岡好一的《老屋說》，刊登在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99年12月3日）的《知新報》。^④從第一期到第四期，可以看出是每週演講一次。後來慢慢發生了變化，很可能是一個月三次，所以到1899年8月26日演講第十四期。再以後，演講次數越來越少，松岡好一《老屋說》是我們在《知新報》上見到的澳門茶談社演講稿的最後一期，是否可以說明澳門茶談社到1899年年底時準備停辦？之後，再未見澳門茶談社之名。可見，戊戌變法失敗後，部分保皇派勢力聚集澳門創辦鏡湖茶談社，以集會演講的形式繼續展開新政變法的輿論宣傳，張壽波創辦的茶談社實際上成為康梁以澳門為保皇派大本營戰略構想中的部分。

值得指出的是，張壽波族叔張仲球並未參加澳門茶談社的創辦及其運作，可以說明，在澳門變法維新的進程中張仲球之表現似乎要比張壽波來得更穩妥和保守一些。從宮崎滔天對張玉濤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問題：

在我到香港以前，南萬里已經到過澳門，結識一位叫張玉濤的。因此，我們一到澳門便先訪張君與其訂交。並想借此打聽何某的住址。張君情意懇摯，邀集同志，設宴款待我們。他的談論頗中時弊，足以鼓舞志士的鬥志。但是每逢涉及會中秘密，便噤口不言。強自詢問，他只是提筆寫道：“內有康有為先生，外有孫逸仙先生，中國之事，還不能說是毫無希望。”^⑤

張玉濤不僅崇拜乃師康有為，而且還推崇孫逸仙，稱他為中國的希望。可以反映，張玉濤思想上的某些激進部分，而張仲球雖然有一定的新思想，但他應該還是一位保持着更多中國傳統的富裕鄉紳。所以，他並沒有親自介入在維新運動中比較激進的澳門茶談社。

（六）從澳門張氏學塾到蒙學書塾

戊戌政變後，張壽波遭到了各方面的攻擊，引起了張氏家人的擔心，其養母吳太夫人教訓張壽波稱：

① 《知新報》第79冊“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110—1111頁。

② 《知新報》第82冊“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158—1159頁。

③ 《知新報》第97冊“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401—1402頁。

④ 《知新報》第107冊“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1996年，第1561頁。

⑤ [日]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佚名初譯，林啟彥改譯及注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花城出版社聯合出版，1981年，第114頁。

《大易》：天地閉，賢人隱。汝猶未解耶。汝務近名，不務蓄德，非先世之志也。

宜再求學，以藥汝短。^①

張母的話就是勸導張壽波當務之急是要繼續求學，以彌補自己所短。為了避開戊戌政變的風頭，張壽波聽從了養母的勸導，離開澳門，東渡日本，一為求學，一為避難：

君唯唯不敢違，遂東渡遊學日本。己亥（1899）生子樾澗，時君就橫濱實習商業。

辛丑（1901）回國，駐漢經商。癸卯（1903）日俄戰事，乃助容翰屏募集紅十字會捐款，得政府獎章。甲辰（1904）以還，先後生女越羣、越姚。時君已率妻子復東渡留學，入東京帝國大學，選科轉研政治、經濟之學。^②

樾澗，為張壽波之子，生於光緒己亥（1899）二月二十六日，^③據1899年5月4日的《申報》，張壽波和張心湖、張仲球等人還在報上刊登告白，發表了歌頌署理前山參將黎鏡臣蒞任十三年德政的頌詞。^④也就是說，張壽波在1899年上半年還在澳門，應該是該年下半年離開澳門前往日本。到日本後，擔任神戶同文學校校長。^⑤1901年回國，在漢口經商，1904年又攜全家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1907年立憲派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張壽波在調查科擔任職員，還被委任為政聞社評議員。^⑥直到清朝滅亡之前再也沒回到澳門，而這個時候的張仲球卻繼續在澳門堅持他的教育事業。據《嶺南學生界》之《澳門張氏家塾》記載：

張氏家塾，在澳門南環，乃香山張心湖君、張仲球君所設，以訓課子女、弟妹者也。張君兄弟嘗於戊戌年，在澳門與同志創辦原生學堂，惟時風氣初開，生徒濟濟。旋以政變之故，各人方畏新如虎，來學者稀，原生學堂遂於庚子年停辦，而張君因此創家塾焉。塾中男女生徒僅十餘人，而其購置書籍、儀器、圖畫以及化學藥料幼稚恩物等，計算數千金。凡教科適用之品，殆無不備。漢文教習為盧湘父君，盧君曾游日本，考求教育，嘗謂中國語言與文字相去太遠，故中文難通，而普通智慧遂以遠遜他國。今即不能如西國之語言文字合而為一，亦必求其兩者相近，學童乃易了解，蓋淺順而完全者，乃行文之正例。至於倒裝之句，換字之法，省文之語，所謂飛行絕跡，不可捉摸者，此行文之變例。而實為蒙學之障礙，故常編撰蒙學新書，以誘導初學，俟正例之文法既通，然後語以變例行之數年，歷有實驗。今則生徒讀史讀報，以及涉獵諸書，頗有頭緒。英文教習為黃耀裳君，黃君留學美國，凡閱九年，品學俱優，亦深於教育者也。

①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張君玉濤事略》，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0頁。

②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張君玉濤事略》，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0頁。

③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3冊卷3《兆沖公房》，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42頁。該書第4冊《雜記譜·樾澗》，第1頁稱：“樾澗，乃十九傳孫壽波之子也。壽波提倡佛教，於戊午年就濠鏡故居創功德林道場，本願奉母率家族修持淨業。會庚申春，微軍老和尚應壽波親家簡氏禮請，駐錫於港澳間。時樾澗朝夕親炙，豁然頓悟，跪請出家，時年二十二歲，乃隨微公之杭蘿度，法名妙持。”

④ 《紳耆親筆簽名告白》，《申報》1899年5月4日第9356號，第14版。

⑤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錄，轉自石雲艷：《梁啟超與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頁。

⑥ 中國史學會編輯：《辛亥革命》第4冊《政聞社職員名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20頁。

今歲之春，復延徐甘棠君為格致教習，徐君本為嶺南學堂漢文教習，時適在澳，兼就斯職。徐君研究化學，誨人不倦。九月後，嶺南學堂由澳遷省，徐君以此離澳，生徒猶有去思焉。塾中生徒分為高等、尋常兩班，尋常專習中文，高等則中西並習。生徒之年齡，女子較長，而天資學力，亦以女子為優。其中如張小嫻、張婉儀、張婉貞等，亦女界中之新少年也。原生學堂停辦以後，陳子褒君遂在澳門開設蒙學書塾。近來徒侶日眾，分設多處。然陳君嘗言：其試驗教育得力於原生學堂者甚多，故澳門蒙學，實張氏兄弟為先導云。夫凡事，患不種因，不患不能結果。他日張塾之生徒，其必有蔚為通才，以酬張君之志願者歟。^①

此文對澳門張氏家族介紹得相當詳細，即庚子年原生學堂停辦後，張心湖和張仲球兄弟在澳門南環（即南灣）創辦了以培訓家族子弟的張氏家塾。該校男女學生雖僅十餘人，但張家對該校的教育設備投資甚多，“計算數千金”。一個十餘人的家塾投資數千金來辦學，可以反映這個家塾在當時澳門教育界的地位。當然，也反映了張氏家族在澳門的勢大財雄。該家塾分為尋常班和高等班，尋常班只教中文，而高等班則要兼習中西。這種十餘人的家塾，還分兩個層次的教育，亦可見其教育品質之優良。特別是該校聘請的教師，盧湘父，兼習中西的著名教育家；黃耀裳，長年留學美國，品學俱優的英文教師；徐甘棠，原為嶺南學堂的漢文教師，又兼通物理化學。由於該校注重於女子教育，培養了一批“張小嫻、張婉儀、張婉貞”等張氏家族的優秀女性，被稱為“女界中之新少年”。該校為了掃除蒙學的障礙，還編制了許多有關蒙學的教材，如張仲球就親自編撰了《趣味三字書》、《修身書一卷》、《名物書一卷》作為學塾的教材，上述三書稍後也為陳子褒在澳門創辦的蒙學書塾的教材。^②張氏家塾存在的時間應該至光緒三十年（1904）結束，而隨之取而代之的是陳子褒的蒙學書塾。張氏家塾在澳門存在雖然只有四年，但卻是繼原生學堂後在澳門延續的採用西式方法結合中國傳統創辦的近代學校，其意義極為重大，在澳門教育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以往澳門教育史研究者並沒有給予過多的關注。近代著名教育家陳子褒先生稱自己創辦的蒙學書塾：“其試驗教育得力於原生學堂者甚多，故澳門蒙學，實張氏兄弟為先導云。”^③從原生學舍到張氏家塾，張氏兄弟不斷在澳門的教育界努力耕耘，不僅成為了澳門近代教育的先驅者，而且由他們所開創的澳門近代學校及他們所提倡的新式的教育風氣，都成為了後來澳門各學校的先導和楷模。

結語

綜上所述，源起於廣東曲江張九齡之後的張氏家族，自宋季遷到香山鐵城後家族不斷繁衍發展，由於香山地近澳門，特別是鐵城張氏家族的南屏一支更是與澳門一衣帶水、毗鄰相接。從清康熙開海以後，南屏張氏家族就開始遷居澳門，同時也與澳門發生為極為密切的關係，或以婚配

① *The South China Collegian* (《嶺南學生界》), Vol. 1, No. 8, The Collegian Stock Company, Canton, China, 1904, pp. 22-23.

② 蘇曉君：《蘇齋選目》，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第228頁；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369—370頁。

③ *The South China Collegian* (《嶺南學生界》), Vol. 1, No. 8, The Collegian Stock Company, Canton, China, 1904, pp. 22-23.

的關係與澳門聯姻，或是以商貿的形式開始到澳門經商。清道光以後，南屏張氏家族移居澳門的人越來越多，創建了張緒光堂和張蘊福堂，而且也蓄聚了豐厚的資財。到晚清維新變法運動開始時，“南屏二張”更成為當時澳門最有影響力的維新派風雲人物。張壽波雖為康門弟子，也積極地參加了各項維新變法運動，成為維新變法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但田野橘次對他的評價仍然是“張氏之思想為博愛主義，彼非革命家，而實溫厚之教育家也”。^①而張仲球則更是傾全部精力和資財投身於澳門近代教育的教育家。維新變法失敗以後，“南屏二張”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前者仍然繼續走在保皇立憲的政治道路上；而後者則繼續他的教育救國的道路，不僅在澳門開辦張氏學塾，1905年他更在擔任澳門鏡湖醫院值理時創建鏡湖義學。^②後來則完全隱居於澳門，憑着自己家族積累的財富，在澳門創建了著名的“張園”，^③過着田園山水、吟風弄月的閒適生活。然而，民國以後，“南屏二張”都先後遁入空門，薙髮為僧，張壽波法號為“觀本”，張仲球法號為“觀圓”。該家族還在澳門三巴仔街創建了著名的功德林，“南屏二張”成為了民國時期澳門佛教界極具影響的人物。觀圓詩“原生妙入無生國，功德翻成報德天”，^④恐怕是對他們人生最好的總結。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日]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運動》，上海：新智社，1903年，第105頁。

② 《澳門第一所免費義學——鏡湖義塾》，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1頁。

③ 《張園》，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74頁。

④ [民國]張建圖、張家賜：《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第4冊《積慶譜·行狀》，廣州暨南大學小萬卷樓藏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第11頁。